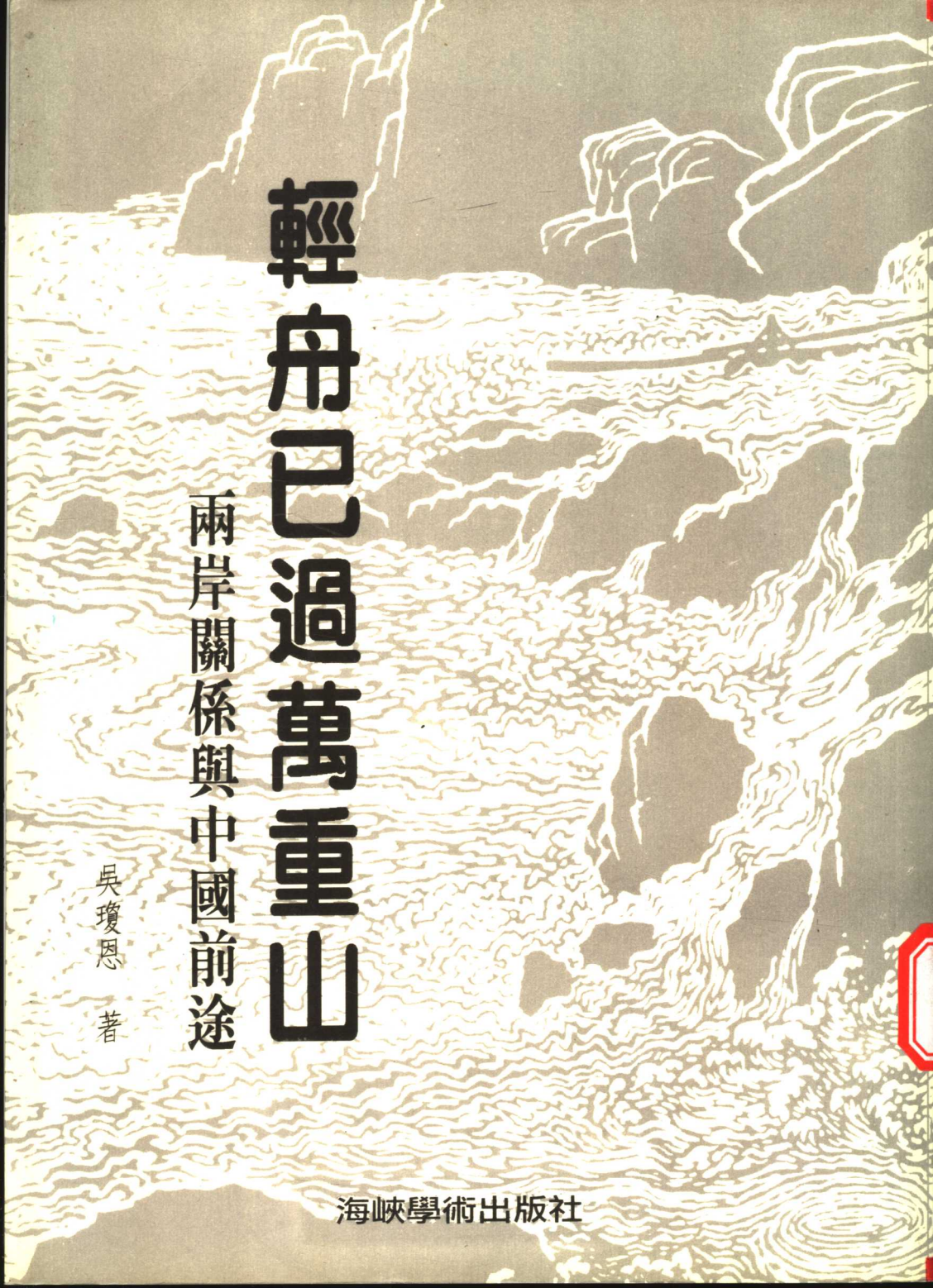




輕舟已過萬重山

兩岸關係與中國前途

吳瓊恩 著

海峽學術出版社

文化戰略與中國前途

一致對外爭取中國崛起的時機

從中國文化前途看中國統一問題的實踐

一個人、一個政黨、或一個政府領導人觀察外界事務的方式，其所根據的理據和分析的結果，表面看似客觀，深一層看，往往是個人認知結構或世界觀的投射而已，由於這種不知不覺的認知方式投射出去的結果，往往使自己所看到的世界陷於自己主觀所限定的世界圖案中，兩岸統一問題的爭議，即是這一問題最好的說明。

沉睡中的經濟巨人

最近，朝野雙方政治人物紛紛研討「一個中國」問題，其論點雖各有依

據，但背後的世界觀甚為狹隘，只曉得站在「台灣本位」的立場，一廂情願地從分裂國家模式中尋求定位或出路，鮮能從民族文化共存共榮的命運，從大方向大角度來看待中國統一問題。我們試舉例如下：

「因此，集思會在總統直選、單一國會、資深民代限期退職的主張上，它是站在台灣本位的基礎上來建構政治體制，而較少大中國的包袱，它在居間協調朝野的衝突上，抱持『求同存異，共生共榮』的心情在任勞任怨……」（《集思週刊》，民國八十一年五月二十日）「現在的一個中國是指一個『分裂的中國』。現階段一個中國的合理詮釋，應是植基於『分裂國家』共識上之一個『分裂的中國』。海峽兩岸能否由『分裂的中國』過渡到『統一的中國』，即在於雙方是否願意在分裂國家的模式中尋求定位方式的突破。現在，正是最關鍵的時刻。」（黃主文）

讀者請看，這一看法背後的世界觀是什麼呢？它所提出的一個中國，是站在「台灣本位」的基礎上，從分裂國家中尋找理論根據，而所謂的「求同

存異」，亦不過是以台灣的政治世界為範圍而求朝野之同，存朝野之異罷了。這種「台灣本位」的世界觀，雖不便明說是台獨的主張，實際上即是一種獨台的理念。我們要質疑的是，為什麼不站在全球戰略的觀點來看待中華民族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有共存共榮，亦有相互競爭的事實，而求國共兩黨之同，存國共兩黨之異呢？祇站在「台灣本位」立場以求自保，突破僵局，未免一廂情願了吧！難怪台北提出仿兩德模式簽訂兩岸互不侵犯協定的構想（邱進益）或「一族兩國」（黃主文）、「一國兩國」（陳水扁）或「一國兩府」、「一國兩區」等等主張沒有一個不受中共拒絕的，亦無一非一廂情願之主張者，其不可行或必然失敗，正反映了我們所提出的種種主張，根本上只求台灣朝野共存共榮罷了，沒有站在中國人立場或民族文化立場提出主張，與中共共存共榮，這種狹隘的世界觀，亦說明了台北的政治人物已然失去了全球戰略的警覺性，此一立場若不改變，永難尋求台灣的出路，畢竟政治是講實力的，台灣也沒有當年西德的實力，因為在所有分裂國家中，祇有

台海兩岸的「政治實體」最不成比例。尤其近年來中共在改革開放的政策下，短短四五年之內，從二十億美元的外匯存底躍升為四百六十億美元，幾乎每年成長一百億美元的速度，難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Paul A. Samuelson把中國大陸喻為「一個沉睡中的經濟巨人」，現在鄧小平南巡後加速改革開放，這一經濟巨人似乎已經醒了，他要利用資本主義的優點，來提高生產力和綜合國力及人民的生活水準，這樣一來，中國大陸的外匯存底不久將來即可趕上台灣，使台灣唯一的本錢頓顯無力無用，早已失去談判的有利籌碼。（見《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第四版：〈一個沉睡中的經濟巨人：中國大陸〉）

勿迷信美國政客的新主權論

如今，中共又開放台商產品內銷，台灣當局深恐造成產業空洞化，也拿不出有效的對策，再加上台灣社會的貪得無厭（有Casino Society之稱），

朝野政治人物的權力鬥爭早已騰笑外邦，在功利主義勢利主義主導之下，早已變成高度異化的社會（The Society of Alienation），變成「精神空洞化」與「文化空洞化」，其文化創造力或生命力之軟疲無力，處處顯現嚴重的病態現象，其前途著實令人憂心忡忡。怎麼辦呢？出路在那兒呢？筆者以為只有從中國文化前途為著眼點，把「一個中國」註釋為「一個文化中國」，站在民族文化共存共榮的立場，與中國大陸互相合作，一致對外，勿迷信美國人李潔明或白樂崎的新主權論，或美國外交專欄作家J. Gelfand「分裂中國」（Breaking China Apart）的主張（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美國New York Time）而掉進他們的陷阱，自以為他們的主張「顯著加強了台灣的地位」而沾沾自喜。這種以美國人撐腰而企圖模糊一個中國的主張，無異自縛手腳，實際上等於台獨或獨台，如何能與中共取得互信合作，共禦外侮呢？（見台北《集思週刊》，民國八十一年五月二十日。此一週刊乃立法院次級團體集思會的宣傳刊物。）

其次，上述狹窄世界觀所投射出去的主張，亦缺乏中國歷史文化在當代與世界各民族文化消長起伏的競爭性之警覺。他們援引金耀基的說法：「一個中國固然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理念，但一個中國卻不必一定由『一統性』的國家型態來體現。秦漢以來一統性的國家型態實際上不必是『歷史的必然』，更不必是唯一或最好的型態。的確，我們必須承認並且深思——中國文化最璀璨綺麗的時代是在列國並立的春秋戰國，而不在大一統的秦漢及之後的帝國時代。」這種說法固然言之成理，但忽略了一點，即中國文化的自主發展，在秦漢時期或之後，並無強勁的外國文化侵略或競爭之事實，後來的印度文化東來亦經消化，而創做了中國第二波的文化盛世，在宋朝達於頂點。可是，自此以後，大約西元一六〇〇年起，中國文化由盛而衰，西方文化卻由衰而盛，四百年來，中國文化之衰敗以及中國今日之分裂之事實，乃中國文化無力因應西方強勁文化之侵襲的結果，所以檢討今日分裂中國之事實，固然中國人有責，西方人亦難辭其咎。因此，目前談兩岸統一問題，絕

不可忽視今日的中國文化已非往昔內部問題，而應著力於與其他民族文化競爭的事實，如果不把握此刻中國文化貞下起元的關頭，好好地求同存異，若再過十年，歐洲美國經濟復甦，日本政治力量加強，中國那時因應列強將備感吃力，於兩岸中國人均無益處。所以，未來十年將是中國人或中國文化復興的重要關鍵時刻，勿以美國的理論為護身符，他們的理論豈是以中國人的利益或前途為考量的？

從中國本位出發貞下起元

何以說未來十年是中國文化貞下起元的關頭？讀者請看下列四個事實：

一、此時此刻為鴉片戰爭一百五十年來，中國人的國防力量最大的時候，已無列強侵略中國的顧慮。

二、此時此刻為一百五十年來，中國人的經濟力量最富庶的時候，為中國人有史以來生活最好的時候。

三、此時此刻為一百五十年來，中國人才最多的時候，幾乎西方學術各個學門，皆有中國人才在研究。

四、此時此刻台灣的外匯存量為世界第二，香港是亞洲與世界金融中心，中國大陸的重工業和國防工業以及廉價勞力，充沛的資源，形成中國第三波新文明崛起的龐大競爭力最有利的因素。

以上四個事實，我們有信心，在當前歐西文化筋疲力竭，斯拉夫文化由盛而衰，阿拉伯文化軟弱無力的關頭，中國文化歷經一百五十多年來的憂患衝擊，也到了一個貞下起元的歷史關鍵時刻。

基於以上的觀點，盱衡中國的統一形勢，未來工作應在全球文化戰略的高度上，從以下幾點具體步驟作起：

一、兩岸關係應以民族文化利益為重，從「中國本位」出發，共同合作，放棄意識型態的偏見，重新界定我們中華民族所面對的共同難題。

二、中共的「一國兩制」政策，應從政經層面提升到文化戰略層面，兩

岸領導人均應體認到歷史發展已到另一轉折點，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的時代任務均將結束，新的時代即將來臨，應有新的國號，這樣的中國才能吸引全球華人的回歸與認同。理想中國應為聯邦體制。

三、在中華文化全球戰略的構想下，兩岸人民均應繼續努力，共同抵制台灣獨立運動發展，直到其瓦解為止。台獨不僅在實際面不可行，就歷史而言，今日分裂的事實，根本是列強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結果，台灣原來與中國不可分割。

四、在文化戰略的前提下，首應大幅開放並准許大陸學者專家來台灣參加各種學術文化活動，以提升兩岸人民對中華文化意識或戰略的警覺，加速兩岸文化從交流、互惠合作，發展到文化命運共同體的結合。

五、中華民族文化的崛起，不以別的民族文化之犧牲為得計，亦即非「零和博弈」的策略，各民族文化今後的發展有競爭亦有合作的關係，地球只有一個，各民族應發展共存共榮的互惠合作體系。

六、今後亞洲新文明將是世界的重心，當代物理學的新世界觀，新生物學的「心物一元論」，以及「理性與直觀」並重的研究方法，均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儒釋道思想相通。今後西方文化的思想對我們的同化力將日漸降低，中國人不再盲從西化或俄化，而能主動的選擇學習西方文化，超脫「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意識型態的支配，走向有「中國特色」的新政治經濟文化體制。

七、兩岸加速經濟與文化的互補作用，拋棄意識型態的成見，睜開兩眼看世界，不要再自足自滿於左眼或右眼所認定的世界圖像，延誤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機運。

八、祇有中國大陸加速改革開放，無論經濟或政治體制，均應朝向合理的方向發展——有中國人文精神特色的民主政體和經濟體制——才能號召中國人加速統一的進程，一致對外，爭取未來十年崛起的時機。

中國的統一與中國的崛起

文化戰略的思考

一、前言：文化統相學及其限制

中國統一的問題，隨著一九八九年東歐共黨的逐漸垮台，一九九一年蘇聯共產主義的沒落，一九九二年歐洲共同體的來臨，和十月中共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開放路線，以及一九九三年四月兩岸間的「辜汪會談」而愈來愈迫切。這一關係中國歷史轉折點的問題，不僅是當前共產黨、國民黨和民進黨三黨之間的互動鬥爭的「內政」問題，更是一文化戰略問題。

祇有把中國統一的問題，提到「文化戰略」的高度，從「全局的」(holistic)觀點來比較各民族文化興衰的起伏，才能看出「中國統一」問題的獨特意義。

作者之所以如此說，乃有鑒於最近兩年以來，討論中國統一問題，大多是採取局部分析的方法，且偏重政治經濟或軍事等有形因素的比較分析，即使有關文化交流的討論，其方法亦是採用局部分析法〔註一〕。

局部分析法在方法論上固有其特殊的用處，也是目前一般人較常用的方法，但其缺點或限制，有點類似「瞎子摸象」，缺乏全局的、直觀的透視來把握整體特質的優點〔註二〕。

本文在方法論上採取「全局觀」(the holistic approach)的途徑，把問題擺在一種變遷流動(flow)的過程中，假定整體大於部分之和(The whole i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而非如一般學者所習慣的直線因果分析(linear cause-and-effect analysis)，因而看不到問題演

變的多重可能性 (the multiple potential of the movement) 。

這種全局觀的途徑，大約和五十年前雷海宗、林同濟兩位先生提出的「歷史形態學」(Morphology of History) 或「文化統相學」(Cultural configurology) 的方法，把民族文化整體的認識與推進，利用綜合比較方法來認識各個文化體系的「模式」或形態的學問相類似〔註三〕。這種全局觀的研究途徑，早在Spengler所著《西方的沒落》和Tonybee《歷史的研究》一書中即運用這一方法，而在當代物理學、醫學和組織理論的研究中甚受重視〔註四〕。

但是，這種「文化統相學」的綜合比較法，雖然看到各民族文化演進過程中的共同性和差異性，在方法學上則是一種歸納邏輯法 (The Logic of Inductive) 的運用，對過去各文化的歷程所呈顯的特性，進行歸納所得的結論，頂多給我們以警告，但不能決定我們的前途〔註五〕。換言之，這種特性祇是人類文化過去所呈現出來的諸種特徵的可能性而已，並非命定地決定了人類文化

未來的發展方向，因為人類作為高等動物而言，自有其創造未來的自主性（Autonomy）或自由意志（free will）的存在因素〔註六〕。此即構成本論文觀點的限制性，在此先特別提出，以免讀者誤會。

二、創造性思維與中國統一困境的突破

當面臨歷史轉型期，人們不可避免地要面對許許多多矛盾和衝突的困境。然而，解決這些困境時，人們又習慣於舊有的思維方式或固定框架，對問題性質的界定，實際上只是他內在的「認知結構」（Cognitive Structure）投射到問題的解釋上，這樣一來就形成了各說各話，難以突破僵局，取得共識或協商合作的可能。這種認知結構所造成的各說各話現象，很快地被雙方解釋為「毫無誠意」的惡意或非善意所導致的結果。

中國統一的問題目前正面臨這種思維方式的困境，無論共產黨、國民黨、民進黨對這一歷史問題的界定、解釋與所提出的解決方案，一方面都是自己習